



厦门工商集萃

第一辑

民建厦门市委员会
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

编印

☆ 内 容 简 介 ☆

根据两会中央和省两会关于搜集整理工商史料的指示精神，市两会决定将已经初步征集的一些资料加以整理，出版《厦门工商集萃》。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能为我市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咨询服务。

《厦门工商集萃》这一辑的材料，大部分是市两会与市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工商史话》专栏已播出的稿件，加以校阅，适当增删编纂起来的。它着重介绍了厦门近代工商企业的创立及其发展变化概况。内容分为七部分，包括：反帝纪实、行业史话、厂店风貌、地方名特产品、传统食品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有关工商经济史料。这些史料，基本上也符合了我们组稿提出的“三性”（历史性，知识性，咨询性）与“五有”（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用人有度，推销有路，宣传有术）的原则要求。

本辑之中，有几篇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如：《厦门外贸史述略》，《我市侨批业史略》、《厦门市棉布业概况》以及“果菜行业的变迁”等，材料比较完整，比较有系统叙述。至于其它的一些稿件，内容也翔实可信，作者都是和各该行业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或者是当事人，或者是知情者，他们以亲历、亲闻、亲见记述这些史实，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是值得很好研究和参考的。

编 者

目 录

序 言

心意和愿望……………郭 初疆 (1)

关于《厦门工商集萃》的创刊……………邵 庚 (2)

反帝纪实

收回海后滩的斗争

——厦门市商学界一段反帝史话……………涓 涓 (3)

韦士逞凶激起公愤

废止洋行办电专利……………涓 涓 (5)

从番仔街讲起……………石思仁 (7)

行业史话

厦门市棉布业概况……………长 流 (9)

从地产杂货到苏广环球百货

——谈谈我市百货行业的形成和变化

……………忠益、协舍 (15)

百货业和龙岩帮……………林 萍 (17)

厦门外贸史述略……………洪卜仁 (19)

我市侨批业史略……………乔显祖 (24)

华侨投资房地产业……………长 流 (31)

洋行和行商会馆……………方文图 (33)

谈谈厦门的茶庄……………张水存 (34)

解放前的厦门印刷业……………徐振华 (39)

厦门早期的纸业与通美帐簿纸……………徐振华 (43)

厦门针织业的春天……………罗思礼 (46)

厦门书店今昔谈·····	徐克勋 (48)
厦门参茸业·····	王志寿、民娟 (51)
厦门电池工业的发展变化·····	叶秉基 (53)
厦门蔬菜行业的变迁·····	其石 (58)
厦门早期的西医西药·····	调笔 (63)
钟表行业的生产和发展·····	庄载之 (65)
厦门的广告业·····	郭坤聪 (66)
厦门商业网点今昔·····	郭坤聪 (68)

· · · · ·	淘化大同厂的前前后后·····	亚冬 (70)
厂店风貌	集友银行创设始末·····	万里呈 (72)
	名扬一时的惠济堂·····	市民建百货支部 (75)
	黄重吉来厦办工厂·····	民娟 (77)
	厦门商办电灯公司的兴衰史·····	涓涓 (80)

厦门电话公司创办经过·····	吾记 (83)
厦鼓通水话今昔·····	吾记 (84)
厦门罐头厂史略·····	长流 (86)
怀德居老药铺·····	民娟、郭金全 (88)
馥香堂与厦门蚊香厂·····	蒲翰玉 (89)



丹凤高粱酒的来龙去脉·····	亚冬 (91)
“三堂药酒”的来历·····	郭会洋 (93)
风味独特的圆美辣椒酱·····	亚冬 (94)
群众称之为“一见笑嘻嘻”的“一见喜” ·····	陈宗桃 (96)

水仙花牌罐头·····	涓涓 (88)
得天独厚的武夷岩茶·····	涓涓 (99)

安溪茶铁观音·····	揭 渭 (101)
蜚声中外的“片仔癀”·····	纪 人 (102)
不崩嘴不卷刃的元合剃刀·····	赖 英 (103)

传统食品

色味具佳的“黄金香”肉制品·····	吴正理 (105)
厦门庆兰馅饼·····	亚 冬 (106)
传统名点鱼丸汤·····	揭 渭 (108)
老华侨回国探亲品尝虾面的故事·····	吴正理 (109)
“茶米”、“茶桌仔”与茶人之家·····	张水存 (110)

果蔬漫谈

略谈萝卜的品种和用途·····	吴其成 (112)
七月芋头满桌香·····	吴其成 (114)
大众化的蔬菜——菜瓜·····	其 石 (116)
“百果之王”的荔枝·····	吾 舍 (118)
怎样挑选西瓜·····	民 娟 (120)
秋后初冬蕉更香·····	吴 濫 (121)

经验交流

做好生意一靠店风二靠广告·····	林 萍 (124)
从一块招牌说起·····	王志寿、民 娟 (126)
老行家“一拳定等级”·····	纪 人 (128)
谈谈市场预测·····	林 萍 (130)
二化厂的生财之道·····	长 流 (132)
永康成用人三诀窍·····	林 萍 (134)

心意与愿望（代发刊词）

郭祁疆

帝国主义炮舰打开厦门口岸以来，已经快一个半世纪了。随着口岸的开放，厦门工商业在外强的侵袭、内部的竞争下，艰辛奋发，自强不息，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颇有影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就陈列着厦门造船工场的照片，代表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说明了厦门工商业的地位和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厦门工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提高到新的水平。现在，厦门的工商业，不论重工、轻工、食品、手工，还是商业、服务、外贸、供销，都有相当的规模。三十五年来，工商界人士听从党的召唤，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留下了跋涉的足迹。虽然经过十年动乱的磨难，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工商界人士的精神是奋发的，对党的政策是欢欣鼓舞的，表现了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忱。

在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民建、工商联整理编辑了《厦门工商集萃》，这是一份前人创业的记录，目的是为研究厦门工商经济史留下一点可寻的资料，也作为一份微薄的礼物，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表示我工商界人士的心意。在这本小册子里，有我市工商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不少老厂老店艰辛创业的经过和名牌产品的传统制作方法，有经营管理提高效益的经验教训，还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字里行间，一片赤诚。如果这些能为建设厦门特区有所借鉴，能为发展特区经济有所裨益，能为发展统一战线有所帮助的话，工商界同仁将十分荣幸。

由于时日的迁移，资料的残缺，更可惜的是工商界老一代人士相继去世，小册子所涉及的范围还相当不够，现作为第一辑内部发行，希望我两会同仁阅后有所启发，把自己的创业经历、经营心得等写出来，以示后人！

关于《工商集萃》的创刊

邵 庚

厦门是我国东南良港，早在1394年就有外国商船来往。1680年开始对外贸易。1842年开为“五口通商”口岸后，工商业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厦门也是有名侨乡，海外人缘多，地邻港、澳，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内外交往频繁，因此，各类工商企业几乎和“三胞”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市场的角逐，优胜劣败。解放前，厦门工商业经过盛衰存亡的严峻考验，有着艰辛的历程。解放后，在党的和平赎买政策感召之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经济恢复和建设作过有益的贡献。由于工商界同仁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营管理经验，发挥了技术专长，曾创立过不少名牌产品和名点名菜，至今在海内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的经营特点，是过去赖以角逐生存的条件；当前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可作为企业改革的借鉴。

市民建、工商联和人民广播电台，自去年以来合办“工商史话”专栏，搜集、撰写有关厦门工商史料六十余篇，陆续发播；现更将原稿加以系统整理，修正充实，自辑《厦门工商集萃》一册，作为内部刊物发行，就是从这个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出发的。

厦门全岛划为经济特区，建设步伐正在加快。这一刊物如能为特区建设和发展经济起多少咨询作用，也是我们两会和两会成员为四化服务应尽的一点责任。



收回海后滩的斗争

——厦门商学界一段 反帝的史话

涓 涓

最近，在市民建、工商联退休老人活动室里，有几位老年的工商业者在畅谈当年海后滩反帝斗争中，我市商务总会带领工商界和全市人民一道坚持斗争到底，最后取得胜利的一段历史。大家听了很受感动，笔者爰志如下，藉以互相勉励：

甲午战争后，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利用特权在海后滩租地填筑，扩充地盘，遭受我市人民反对，工程未能进展，心怀不满。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厦门德律风公司（即电话公司）在海后滩竖立电杆，竟受英人横加阻挠，要公司立约纳税，才能同意竖杆，经屡次交涉无效，激起群众的义愤，纷纷表示抗议。到了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全厦学生开会以示纪念，并列队经海后滩，英领事出面干涉，成为我市人民抗争海后滩的导火线。

当时，由于我国国内军阀混战，英领事藉词防卫，令陆战队登岸，并于海后滩地方，左边自太古棧门首至海止，右边自义和洋行门首至海止，又于海后滩后面的史巷路头，新路头、番仔街三处巷口，一律围筑砖墙，悬挂所谓“大英租界

地、闲杂人等不许乱进”等字样的牌子，首先是学界出面抗议，厦商务总会立即响应，和全市人民一起参加反帝斗争，并以厦门商务总会、教育会等名义联合向有关当局呈文陈述“英国洋行越界设隘、违约侵权，阻碍商旅”，请政府向英领事馆交涉。詎料“滩案”正在交涉之际，英商太古洋行又在该行海滩前任意填筑侵占领海，厦门市人民忍无可忍，商学各界在市商务总会负责人黄鸿翔、黄廷元和教育会会长卢心启等人在商务总会会址（原岛美路头，现中山路市工商联会址）集会讨论交涉办法，一方面派黄廷元、卢心启赴京请愿，另一方面组织保全海滩公民会，呼吁国内外各团体支援。鉴于太古洋行仍强筑码头，阻止不听，公民会乃公决采取措施抵制，工人停止为太古洋行筑浮桥，下海工人拒绝为太古行理货。英人老羞成怒，令英兵在太古洋行楼上架炮示威，并擅自逮捕工人，殴打私禁。我市代表向英国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并且驳斥所谓反对英商扩地非多数民意，胡说什么“厦埠总商会、教育会等团体组成公民会是少数人意见”的谬论。太古行东见众怒难犯，乃暂停填筑。后来，又经过多方周折斗争，英帝国主义虽冥顽狡赖，但在国外声援和公众据理力争与抵制太古之压力，处于无理无利的地步，同意坐下来谈判，至1922年11月间海后滩案件才获得解决，我方交涉胜利，由陈道尹、刘光谦在驻厦英领事馆签订合同三条：

（一）、英商太古行建筑飞桥，应照以前位置并遵守光绪26年所合订之八条章程，于桥完竣后，因桥飞越中国领海，每年由该行缴纳租费大洋三十元，交驻厦英领事转中国地方官。

（二）、中国地方官承认保护英商租界内各洋商之贸易

不受拦阻，惟人民不妨碍洋商之贸易而遵守中国法律之通行，不得谓为拦阻。

（三）、现滩地内所竖旗杆及所升英国旗，即行移在英商租界内，各公路尚未撤除三个隘门应立即撤除，以利交通。

根据上约，又经一番说理斗争，围墙撤毁，英旗移竖，海后滩收回，厦门人民经历十余年抗争主权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

韦士逞凶激起公愤 废止洋行办电专利

消息整理

1913年，上海英商韦仁洋行工程师皮利来鼓浪屿，与工部局订立安装电灯二十五年限专利权的契约，这家英商在晃岩路一座楼房设办事处，在黄家渡附近建发电厂。同年八月开始放电供用户照明。

二十年代初期，韦仁洋行把这项专利权再转让给上海英商礼昌洋行，该行派工程师麦肯那来鼓浪屿接管，把办事处迁到原主利大药房楼上（现晃岩路2号）。不久，该行另派工程师兼经理、英籍犹太人韦士来接任。

1925年11月10日，有一位广东大学的学生叶清泉路过鼓浪屿，在洋墓口（现龙头路）无故被电灯公司经理、英籍犹

太人韦士猛甩一杖，清泉怒不可遏，回他一拳。因之，两人扭打在一起。一个巡捕闻讯赶来，吹哨笛召来几个巡捕，把叶清泉抓往工部局，群众见状，十分愤怒，随后赶到，把工部局团团围住，高呼反帝口号，要求无条件释放叶清泉，巡捕向空中鸣枪，企图驱散群众，更激起义愤，群众坚持到深夜，工部局被迫把叶清泉释放。

翌日，厦门几家报纸刊载这件事之后，全市哗然。当时，厦门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罗扬才，厦门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立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许多商店也纷纷响应，不卖给外国人任何东西，鼓浪屿居民还要求收回外国人办的电灯公司。舆论界发表文章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要求收回外国人办的电灯公司。英国领事馆领事许立德看到社会舆论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激昂情绪，害怕风潮扩大，亲自出面在领事馆举行招待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调解，但无法平息。最后，由罗扬才同志研究提出：一、驱逐韦士出境；二、要韦士登报道歉，并在肇事地点当众道歉；三、不许洋人再有类似侮辱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四、英商办的电灯公司应交还中国人自办等四项，作为与英国领事谈判的条件，并迫使英国领事答应。结果，韦士在登报道歉后被驱逐出境，英国人办的电灯公司也由中国商人接办。以后就改为“鼓浪屿中华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从“番仔街”讲起

石思仁

本市海后路旧太古洋行仓库附近有一条街道，现叫昇平路，前称为“番仔街”。为什么叫“番仔街”？这是有其来历的。过去，我们对外国人统称为“番仔”，而这条街道，大部份是洋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番仔街”。

这条“番仔街”的形成，就是帝国主义在厦门办洋行，进行经济入侵的历史见证。

甲午战争以前，英国首先在厦门取得通商特权。1845年英商创设德记、和记两家洋行，随后又陆续开设了汇丰、怡记、合记、宝顺、水陆、协隆、台湾记、广顺、德建、新钦兴、利记、丰记、福昌、成记、麦南美、福士特、嘉士、查士等共二十家，另设一个厦门船坞，还在鼓浪屿办了龙头酒店及屈臣氏、主利两家药房。同时，英属印度也来厦设立裕记、安记、庆记等三家洋行。1850年，德国先后设立宝记、新利记。继之，美国开设旗昌、美时两家。西班牙开设瑞记、天仙茶园。丹麦开办大北电报局。这一时期，厦门的各国洋行共三十多家，其中英国占三分之二强，这些洋行的仓库或办事机构，大部份觅址于海后路的滨海之处，毗连一片，因此，就形成一条“番仔街”。

这些洋行，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里建楼房，盖仓库、筑码头、设船坞，横行无阻。1864年起帝国主义更控制了海关，历任的税务司都是外国人。自从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后，工部局首席一职，长期以来也由英国人担任。1895年1月27日，成立外国商会，英商德记、和记的大班勿汝士、商徽两人分任正、副董事长。英商协隆、美商旗昌、德商宝记的大班均充任董事。在所有洋人的组织中，英国居优势。1896年以后，英国还增设太古洋行等，经营轮船代理业，最兴盛时达三十家左右。日本于1873年已在厦门设立领事馆，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在厦门设立洋行。1901年在海后路设三井洋行出張所，专营进出口贸易，设大阪洋行专营海上运输，设台湾银行分行进行金融活动。1904年，美国增设惠华洋行和美孚行、德士古两个石油公司，1907年，英国设亚细亚石油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列强无法东顾的机会，大肆扩张。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元气大伤，英国洋行的营业额锐减，日本的经济势力已取代了英国，跃居首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在厦洋行撤走。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三井等洋行又卷土重来，形成独霸局面。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日本财产被接收，欧美帝国主义洋行先后复业。此时美国在菲律宾等地大量倾销剩余商品，这些商品由我市商人转运来厦倾销。在抗战胜利后三、四年中，美货的输入一直占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全国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中国，结束了各国洋行百年来的掠夺史。

厦门市棉布业概况



长流整理

一、鸦片战争前后外布垄断市场

据厦门志记载：清道光十二、十三年（1832—1833年）厦门已有商行五、六家，其中有经营或兼营棉布、丝绸商行。当时，厦门绸布商主要经营本省漳州、同安一带土布，也有一部分丝绸。除本销外，大部分由海道转运到宁波、乍浦、天津及台湾，并从宁波换进江浙棉布及各种货物来厦销售，而且转运到南洋各地。1842年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倾销纺织品主要市场之一。当时海关操在外人之手，关税不能自主，进口税收不断降低，1843年到1858年15年间棉布进口税率平均降低幅度达80—60%。帝国主义国家的棉布大量涌入，到1910年外布经由海关输入数量相当可观，达20余万美元。到了1928年外布已充斥市场，平均每年由海关输入竟达270万美元以上。不到30年外货的输入量激增到十三倍左右，增长的速度实在惊人。从1832年到1833年当时经营棉布业的商户只有五、六家，以后逐渐增加。到了1914年专营棉布商户数达40家，营业额达六百多万元。从1899年到1931年厦门整个棉布的输



入量来看，国产布有增长，但数量小增长慢，每年还不到20%，由1912年占总输入量13.19%到1931年增到占34.96%，而外货仍占65.04%。外布输入数量多也可以从解放前厦门全部外货进口的外布的比重中看出，1926—1928年三年中由厦门进口的外布占全国外布进口的比重虽然不大，平均约占2%左右，但占厦门整个进口的数字极为可观，这三年中由厦门海关进口的外货共3700万元左右，而光外布一项占598万美元，约占全部外货进口的16%，如将呢绒绸缎包括在内，外布进口共为780万美元，占厦门全部进口外货的21%以上。

外布垄断市场同样反映在输入品种不断增多，从鸦片战争到1932年以前输入品种逐年增多，开始只有斜文，洋白，逐渐扩大到各种布类和呢绒绸缎乃至毛织品和人造纤维，到1926—1928年品种更多。

三十年代初，我市棉布商户增至63户，资本额达106万元，当时国产布输入虽有很大增长，外布经海关进口数量虽有减少，但走私入厦门的外布数量很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它的代理人在厦门设立行号，控制批发市场，并组织大量走私，日货充斥市场，部份棉布商经不起这种打击，因而歇业倒闭。抗战胜利后，厦门棉布业虽以国货为主，但走私之风甚盛，外布仍然泛滥市场，其区别不过是美国货代替日本货而已。

二、洋行林立棉布商遭受打击

过去外商对厦门棉布业的控制和垄断，除大量倾销进口洋布外，主要是通过设立各种洋行和组织直接经营棉布。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在厦设立洋行商号，代办和直接经营棉布批发业务。据调查、截止二十世纪初期（清光绪年间）外

国人在厦开设的洋行有十几家，如美国的和记、义和、和顺、德忌利士、德记等洋行。日本的菊元、柏元等洋行，德国的宝记洋行，法国的义源洋行。他们利用掌握货源，资金雄厚的有利条件，通过赊销、折扣等方式来推销剩余商品，如办期货，一般可以赊销30天，信用好的还可以延长到60天，如直接用现金交易，则可用99%折或98折优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厦洋行纷纷收盘回国，但日商的势力则进一步在市场伸展，特别是1931年开始，通过它的代理人在厦门设绸布批发十几家（大都没有招牌）专营走私生意，并垄断整个厦门的绸布批发，同时组设“厦门绸布组合”来控制市场，并擅自规定非“组合”成员不得经营日货。

本地布商经营洋布，一般都向洋行批购或委托其代办，较大商户则集资在香港或日本设立办庄，采办洋布。同英、胜裕、怡美、新成等商户即在香港组设“乾德”办庄（抗战前收盘）到了三十年代，日货大量输入，同英、胜裕等又合伙在日本神户设“有成”办庄，专办日本丝绸棉布，经营规模较大。其他批发商（或批零户）则直接委托日本神户新瑞兴、裕兴、新记等办庄代办。抗战胜利后，棉布商没有在港另设办庄，所需货品均直接委托香港办庄代配。

自清末以来，本国商人货物进口除了缴纳关税外，还要交纳贡税，转口还要纳厘金，外商则免交上述税款。因此，本地部份棉布商即向外国领事馆申请入籍，避免负担额外捐税。参加外国国籍的以日籍最多。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故加入外籍的渐少。

由于厦门棉布商长期对洋商的依赖，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存在着种种矛盾，特别是三十年代后日本帝

国主义排挤本地棉布，使矛盾更为明显。一些商户无法维持下去，被迫停业，有的批发商只好利用日商不敢对内地放帐的空隙，经营漳、泉各县的生意，以资维持。

三、抗战胜利后棉布业有了较大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棉布业有了较大发展。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户数已达97户，资金177万元。营业额超过1150万元，其中批发户增加最快。1944年只有8户，资本额18万元，1948年已增至49户，资本额达107万元，户数增加五倍，资金增加六倍。与1936年比较，户数和资金都增加二倍左右。

但在蒋政权的反动统治下通货膨胀，走私投机之风遍及全市各个行业，造成了解放前厦门的虚假繁荣，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也反映在本市的棉布行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棉布业发展比较快，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内地布商纷纷来厦经营棉布。当时，除了本地商户如同英、俊记、胜隆、荣丰、坤源、同裕等都逐步恢复元气以外。来自漳、泉闽南一带的有三元、振裕、华大、紫罗兰、天平、耀裕、顺益等。在闽南棉布商资历最雄厚的是永春帮经营棉布的商户，如光大、建德、江山、振源、东南、黎光、益南、同美、金昌等。这些永春帮的商户，抗战期间在泉州等地经营棉布批发资金比较雄厚，而且和上海帮的棉布商店有密切联系，他们在厦门市批发商中占很大优势。

二是华侨投资和侨汇恢复。据调查，1949年侨汇恢复后，厦门市棉布业有华侨资本的共18户，投资345,293元，投资面占当时总户数20%左右，投资额约占全行业总资本